

江苏教育考试科研月报

2026年第5、6期（总第136、137期）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编印

本期内容简介

- 【热点透视】 高考综合改革十年：从政策蓝图到教育实景
- 【学术动态】 省教育考试院首场课题季度交流会召开
- 【域外资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高等教育扩张“无与伦比”；法国公布2026年中高考系列改革方案；英国高等教育面临人口下降与掠夺性招生双重威胁；美国哈佛大学治理成绩膨胀现象；经合组织：高中毕业生做好上完大学的准备好了吗？

【热点透视】

高考综合改革十年：从政策蓝图到教育实景

编者按：自2014年启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来，我国高考综合改革已历经十余年探索与实践。本期月报立足改革的成熟经验，系统梳理破除高考“立德树人”转型的制度演进逻辑，客观呈现“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阶段性成效，深入剖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现实偏差与实践挑战，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提供理性的学术参考与决策依据。

新高考改革十年政策执行分析与优化调整

郑若玲、罗青意（厦门大学）

文章指出，新高考改革实施十年间，在反复的模拟测试、研究论证、实践推进过程中，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已基本实现，但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文章认为，新高考改革试点政策的初始目标包括释放选择权、推动教学变革、转变评价录取方式三个方面：其一，释放选择权。新高考在释放选择权方面大胆改革，致力于扩大学生的选考科目空间，并

实现高考科目从较少选择到自由选择、从文理分科到文理融合的目标。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考生弃考物理、化学科目的现象，导致理工类专业因生源基础薄弱而培养乏力。为最大限度地控制住由于功利性选科引发的选考科目失衡的局面，教育部于2018、2019、2021年接连发布三个版本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使物理、化学

的选考人数得到一定的保障。此外,第三、四、五批改革省(区、市)从上海、浙江的“3+3”科目设置模式调整为“3+1+2”模式,将给予考生的充分选择权调整为有限选择权。其二,推动教学变革。新高考改革秉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推动普通高中对教学组织形式进行变革。2014年新高考政策出台后,选课走班教学成为普通高中的必然选择。其三,转变评价录取方式。上海、浙江作为新高考改革首批试点地区,在招生录取环节实施的综合评价录取、“三位一体”招生等基于多元评价的招生录取方式,成为具体践行新高考改革“两依据一参考”基本制度设计的一大亮点。然而,要真正将“两依据一参考”设计理念落到实处,做到公平公正、让人信服,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考察政策落地实践可以发现,新高考改革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释放选择权”机械性执行。一方面,高校运用招生自主权时“为改革而改革”。高校招生资源和招生能力在短期内无法与招生的扩张速度相匹配,导致了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简章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高校组织的综合素质测试以面试为主,测试中不分专业,缺乏具体的评分标准;高校缺少对后续人才培养环节的跟进机制等问题。另一方面,学生选择考试科目时盲目跟风。高中阶段的学生在面临学习上的选择时往往习惯于依赖他人的指导,缺乏自主选择意识和能力,凭单一标准或情绪化地行使高考科目的选择权。二是“推行走班教学”选择性执行。首先,学校给予学生的课程选择范围较为有限,部分普通高中的“走班教学”模式并未开放所有课程供学生选择,而是对选修科目进行打包,提供定制的课程“套餐”。其次,学校在实施走班教学的程度上较为保守,一些学校仅对选修课程进行开放,或将必考科目以其他形式实行有限次数的走班。

最后,高中部分教师出现消极和倦怠的行为,选课人数多、学科分类多、选择组合多的“三多”,不仅增加了班级数和教学量,而且流动式的班级组织也增加了管理难度。三是“实施多元评价”象征性执行。其一,普通高中对高考考试科目与非考试科目的课程无法做到“一视同仁”。德育、体育、美育等考核内容难以形成客观标准,在高校招生中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其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不仅难以有效保证学生综合素质及能力的提升,而且还可能给一些学生造成负担。其三,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流于形式。综合素质评价的表格式呈现容易让师生产生将表填满、面面俱到的想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评价材料的可信度。

基于上文分析,文章认为,下一阶段新高考改革政策需要从三个方面优化调整:第一,优化政策议程设置。首先,新高考改革要继续坚持正确的思想引领,保障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其次,新高考政策的制定需要对基础教育的实施条件和高校的招生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最后,新高考政策议程设置需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参与度。第二,强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一是加强高中的政策认知和分析能力,积极引导和回应学生非理性选科。二是加强高校的招生自主能力建设,为选拔优秀人才提质增效。三是加快各级教育考试机构的专业化建设,强化教育考试的组织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第三,优化新高考改革环境。一是建立与新高考改革相配套的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机构治理能力和政策持续性。二是完善新高考改革的监督和反馈机制,提升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三是加强新高考改革政策的宣传,提高目标群体的认同感。

(原文刊载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4年第6期)

【一、制度变革与选科机制】

选择是个难题：新高考“融通+选择”改革的历史观照、现实剖析与对策讨论

边新灿（浙江师范大学）

文章系统梳理了高考“融通+选择”改革的历史探索历程。1952年至1965年，高考科目经历了从“不分类”到“分两类”“分三类”再回归“分两类”的演变，均为套餐式设置，无选择性。恢复高考后定型为“文6理7”模式，学生负担沉重。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高中会考制度建立，改革开启探索。

在突破“文6理7”模式的尝试中，上海于1988年率先实行“3+1”模式，将科目组合增至6类，突破了文理两类分科，但因方向科仅为1门，难以满足高校专业对口要求。1991年，“三南”方案尝试“4×4”模式，不设共同科，仅实行两年即因不符合社会认知而中止。1992年，“3+2”模式回归“共同科+方向科”结构，减负效果明显，但因不考地理、生物遭质疑。

在“融通+选择”的前期探索中，广东1999年试行“3+X”，本质是统一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但因高校与学生顾虑，异化为“3+1”。江苏2002年试行“3+大综合”，加重学生负担；2003年改为“3+1+1”，尊重了学生兴趣，但不同组合分数难以通约，引发功利选科；2008年“08方案”采用“3+2+5”，将物理、化学地位弱化，导致考生科学素养下降。浙江2009年“新课改高考方案”设置“18选6”自选模块，体现了文理融通，但因中学固化选择范围，未能充分实现个性化。

基于历史经验，文章总结出四点启示：一是“共同科+方向科”模式符合社会认知；二是考试科目门数宜整齐一致；三是科目数以6门为宜，过少无法满足专业需求，过多则加重负担；四是选考必须解决

科目成绩等值问题，否则会引发趋易避难。

继而，文章剖析了新高考“融通+选择”方案的实施、调整及面临的新难题。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充分借鉴了历史经验，采用“共同科+方向科”结构，统一6门科目，并实行等级赋分以实现等值。然而，改革遭遇了选择困难与功利性挑战。总分取舍制度下，各科同等重要，学生倾向于选择易得分科目。等级分制度预设考生群体水平一致，但实践中群体差异扩大，导致“田忌赛马”式博弈。问卷调查显示，仅约三成学生主要依据兴趣选科，12.74%明确趋易避难，实际比例可能更高。这直接导致物理、化学选考人数锐减，浙江2016级物理选考比例降至30%。

为此，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首先是多措并举扭转物理流失，包括出台选科指引、建立托底保障机制，并从第三批起推行“3+1+2”模式，要求考生必选物理或历史。其次是2021年教育部出台《选科指引》（通用版），实施力度更大的“物化捆绑”，要求理工农医类专业必选物理和化学。但“物化捆绑”也带来了两个新难题。第一，部分“3+1+2”省份中学固化选科组合。第二，部分“3+3”省份出现专业供需失衡与分数线悬殊。2024年山东等地出现“物化缺额、文科暴涨”现象，大量高分文科生滑档。其成因包括：供给端选科要求与计划编制的技术性问题；需求端地方政府评价导向的功利性、中学生涯规划服务的缺失，以及新政转换期的惯性牵引。

最后，文章提出了远景展望与近期对策。远景上，真正的双向选择应建立在招考分离、综合评价与高校“个性化使用”

统考成绩的基础上。如中国科技大学在“三位一体”招生中提高数学、物理权重,台湾地区高校按专业指定科目并差异化计分,均有助于扭转趋易避难。针对当前难题,近期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多措并举落实学生选科权。**中学应遵循“制度设计范围内满足学生选科要求”原则,不得无原则固化组合。国家应出台指导性意见,将尊重选择权纳入中学考核评估指标。**第二,供需两端发力解决失衡问题。**供给端统筹选科要求与计划编制。建议在“3+3”省份允许高校提出“物理与历史”“化学与历史”兼选要求,允许生物医药

农林类专业用“生化捆绑”代替“物化捆绑”;“3+1+2”省份待条件成熟后推广。需求端加强生涯规划教育,利用大数据精准指导学生选科与志愿填报。省级部门应结合选科数据、计划数据培训中学教师,引导学生理性选择。**第三,调整教育评价指标。**严格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将升学率考核与高考奖励脱钩,用录取结果取代“一段率”等指标,引导中学摒弃功利导向,切实落实改革初衷。(原文刊载于《教育发展研究》2025年第5期)

高考选科与高校招生之关系研究

吴根洲、杨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章回溯了高考科目改革的历史沿革,揭示了高校科目选择权的演变轨迹。高考科目改革涵盖设考科目、组合、分值权重及选择性四个方面,其核心在于科目的选择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中,虽有过全科设考与分类设考的尝试,高校仅拥有极小的“虚”关系意义上的柔性选择权。1977年恢复高考后,历经“3+1”“3+2”等模式,直至1999年广东省启动“3+X”模式,才首次对高校科目选择权进行实质性探索,河南、江苏等地亦尝试赋予高校设科权。然而,由于缺乏配套,高校为在生源竞争中占据优势,普遍降低科目要求,导致“X”被降格为“1”。2008年后,多数省份回归“3+文/理综合”模式,高校选择权再度丧失。这一历史反复证明,跳出文理分科、赋予高校与考生双主体地位,需要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文章分析了高考综合改革中选科模式的确立过程,指出科目要求指引是国家干预与调适的产物。2014年启动的改革通过顶层设计确立了高校有限度的科目要求设置权。但在改革初期(2017—2019

年),沪浙试点暴露出新的问题:高校普遍规避高要求,不设科目要求的专业占比极高(浙江达54.17%至61.07%),导致考生弃难就易,引发严重的“弃考物理”现象。为此,国家教育部门及时出台《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增加了“必选多门”的选项,并规定了64个专业类的刚性科目要求,初步遏制了投机行为。

文章详细梳理了科目要求指引的几次调整及其对不同学科门类的影响。为应对“3+3”模式对高中资源的高要求及考生的弃考问题,更好实现高校选才的科学性,2019年出台《科目要求指引(3+1+2模式)》,将选考物理的专业类扩至45个。2021年印发的《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则统一了改革步伐,规定选考物理、化学的专业类覆盖范围分别扩大至69.56%、60.87%,基本实现了理工农医门类的“物化捆绑”。具体而言,理工类43个专业类中,除心理学、建筑等极少数外,绝大多数均被要求“物化捆绑”;农学、医学门类亦经历了从理化生地位平

等到物理、化学地位大幅提升而生物地位相对下降的转变；文科类31个专业类中，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公安学类等少数专业有刚性要求，多数专业仍保持较低门槛。

文章指出了现行指引的局限性。《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虽然在整体上提高了生源质量，但也因过于刚性而限制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导致部分科目相对地位失序。例如，数学类与理化关联度并不高，却被强制捆绑；生物、地理科目的地位被拉低，影响了相关专业选拔。

文章认为，为进一步保障更多高校更多专业招生的科学性，应从三个方面进一步优化高考选科改革与高校招生的关系：第一，保障高校专业与考试科目的高关联度。应适时回调过于刚性的要求，避免陷入“头疼医头”的窠臼，回归专业与选考

科目高度关联的原则，激发高校行使招生自主权的主动性。第二，提高选考科目相对地位的科学性。应修正过度“物化捆绑”的策略，参照早期指引中农医类对理化生平等重视的做法，提升生物、地理在相关专业招生中的地位，纠正文理科目相对地位的失衡。第三，适时回归“3+3”科目选考模式。“3+1+2”模式本是受制于当年高中资源不足的权变之策，如今随着教育资源丰富与改革适应性增强，其“一刀切”保障首选科目、压缩高校选科空间的弊端日益显现。回归“3+3”模式，既符合改革初衷，也有利于高校各专业类对高关联度科目提出要求，使高中阶段各科目回归应有地位。（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5年第5期）

新高考综合改革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历史梳理与结合逻辑

赵莹莹（宁波职业技术大学）

本文追溯我国四十五年来拔尖创新人才选育的历史实践，系统梳理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内涵、培养条件及历史沿革。关于概念内涵，综合来看，拔尖创新人才一方面是具有博专知识、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作为创新型人才，其创新精神与能力、素养和成果处于领先地位，在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中居于引领地位。关于培养条件，研究强调需营造创造性环境，秉持因材施教理念；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阶段教育合力共育，特别是高中和大学阶段的衔接；此外，应推进宽口径通识教育，改革评价方式，建立综合多元的评价体系。在历史沿革方面，我国对拔尖人才的关注可追溯至汉代童子科制度。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可分为几个阶段：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办“少年班”，拉开高校拔尖

人才培养试点的序幕；1985年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相继开办少年班，并探索出“元培计划”“竺可桢学院”等多样化培养模式；20世纪90年代，原国家教委推行“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至1996年共建立83个理科基地和51个文科基地，成为高层次拔尖人才的培育中心；进入21世纪，2003年教育部出台“自主招生”计划，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2009年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珠峰计划”），在5个基础学科试点；2018年发布“拔尖计划2.0”，将学科门类拓展至17个；2020年，历经18年的“自主招生”终止，教育部启动“强基计划”，将选拔节点前置，探索“本—硕—博衔接”的一体化培养模式。这些实践逐步探索形成了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与经验。

文章剖析了传统高考在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方面存在明显局限性：一是“大一统”模式限制个性化、自主化发展。传统高考“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逻辑，导致高中选修课被大量压缩，学生选择自由度小，兴趣与特长难以发展。长期“唯分数”的评价方式，抹煞了学生个性差异与综合能力，扼杀“天才”“偏才”“怪才”的成长。二是大中学衔接不足影响长期性发展。高中与大学教育长期处于自成体系的封闭状态，人才培养连贯性不够。传统高考下，高校缺乏提前介入中学教育、合作培养人才意识；高中受制于“指挥棒”，全然按考试要求设置课程，很少考虑学生长远发展。这种断层导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仅靠高等教育阶段难以完成，违背了人才培养的循序渐进规律。

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论证了新高考改革与拔尖创新人才选育耦合的可能性。第一，综合评价促多样选才。新高考探索建立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体制，弱化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将身心健康、思想道德、社会实践等均纳入评价维度，为高校提供了多样化选才空间，使其能遵循特色化办学导向，甄选与本校培养目标契合的人才。特别是“强基计划”的推出，因循新高考多元评价理念，将选拔对象前置，综合校测和高考分数进行选拔，实现了与综合素质评价政策价值

的高度契合。同时，综合评价倒逼高中育人理念变革，促使基础教育关注学生核心素养与创新潜质，改变“以分数论英雄”的单一评价方式，使学生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创造能力等优势得以发掘，培养拔尖人才的时间节点得以前置。

第二，自由选科破文理桎梏。新高考打破传统非文即理的科目选择方式，赋予学生高度选择权。无论是“3+3”还是“3+1+2”模式，均形成了科目选择与组合的新格局，主动架构起文理互通的桥梁。这有助于拓宽学生知识体系，落实通才教育理念，培养基础扎实、思维开阔、具备跨学科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

第三，志愿填报助生涯规划。新高考将志愿填报方式由“学校+专业”变为“专业+学校”，并取消分批次录取。这一变革倒逼高校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建立在自由选科基础上的志愿填报，促成了高考制度、学生学科兴趣特长与高校专业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从注重学校“牌子”转向优先考虑专业和学科特长，注入“生涯规划”的思维逻辑。高中学校据此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大学也面向高中学生进行相关培训，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明确发展方向。调查显示，高中学生选科渐趋理性，依据个人兴趣、成绩优势及未来信心选科的比例均较高，这有助于提升大学专业的匹配度，助力拔尖人才的培育。（原文刊载于《湖北招生考试》2025年第30期）

【二、考试技术与评价体系】

国际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改革的多层耦合变革逻辑及 对我国构建现代考试制度的启示

阎琨、段梦涵（清华大学）

本文基于国际考试生态模型，构建了大学招生考试改革的五层分析框架，从知识、技术、教育组织、文化、历史五个维度，系统探讨国际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改革

的多层耦合变革逻辑，为我国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提供启示。

本研究借鉴了 Zumbo 等人的五层考试生态模型及 Jo-Anne Baird 加入时间要素

的改进模型，构建了大学招生考试改革生态模型：第一层为内容维度，分析考查的知识形式与能力素养识别；第二层为评价维度，关注成绩测量与等级排序的方法范式；第三层为组织维度，分析政策制度与教育管理规律；第四层为文化维度，探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制约关系；第五层为历史维度，呈现制度演化与改革动因。五层结构相互关联、层层耦合，形成有机整体。

文章剖析了国际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改革的多层耦合变革趋势。在内容维度上，改革趋向多元化，强化对考生能力与素养的全面评估。理论上，Masako Ema Watanabe 提出考试需覆盖经验、理论、工具、价值四类知识，对应多维能力素养；David C. McClelland 主张突破单一智力测试，构建生活能力评估体系。实践上，各国通过知识考查分轨（如英国 A-level、GCSE、BTEC 三轨并行）、题型注重能力（如英美日增加简答应用题）、选科自由化（如日本 6 科 31 门任选）、个性化考试（如法、芬、韩的高校自主灵活考核）等举措，实现了从“知识记忆”向“能力素养”的重心转移，引导中小学重视能力培养，衔接大学教育与职业发展。

在评价维度上，改革强调教育学立场，呈现出综合性与科学性发展的趋势。各国在理论上发展了心理测验学（侧重潜在特质测量）、结果评估（围绕教育目标考查表现）、课程评估（侧重课程学习表现）三种范式，以及常模参照、标准参照、成就参照等模式。在实践技术上，则呈现出范式融合（如美国 SAT 融入课程评估、东亚引入心理测验学），模式混合（如法国降低统考权重、引入高中平时成绩评价），统计技术多元（如韩、中采用等级赋分制强化科目可比性）的特征。改革核心在于平衡技术效度与教育立场，以考促教。

在组织维度上，改革由国家、地方、高校和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主导，形成统一与分散并存的模式。受各国教育管理体制影响，主要包括国家统一考试（如法、韩、

俄，强调标准化与效率），地方政府主持考试（联邦分权制国家，如德国各州完全中学毕业考试，需区域互认机制），大学自主考试（高校个性化选拔，如印度国家重点高校、美俄日芬等国高校自主考核），社会化考试（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如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英美多社会组织竞争，兼具规范性与灵活性）四种形式。各国普遍走向统一与分散结合，以兼顾效率规范与多元需求，发挥国家、高校、社会协同优势。

在文化维度上，社会与考试围绕选才与公平展开博弈，导致文化的多向漂移。选才方面，西方精英文化曾主导考试，后通过增设大众轨、职业轨实现向大众化文化漂移；东亚国家因考试与阶层流动深度绑定，形成顽固的功利应试文化，改革常陷“理想与效果背离”困境。公平方面，印度通过“保留配额”保障低种姓权益，美、智、南非为少数族裔提供配额，日本关注残疾人及少数民族考试权，中国以农村专项计划促进城乡公平。改革与主流文化的适配度决定漂移方向：符合公平、科学选才价值的改革推动正向漂移，反之则引发负向漂移。

在历史维度上，改革呈现进步主义与路径依赖并存的双重取向。进步性体现在美国 SAT 融入认知理论与心理评估技术革新，新西兰调整考试增设职业轨、转向结果评估以适应劳动力需求，俄罗斯改革受国际趋势与技术驱动，展现了对时代变迁的适应；路径依赖则表现为欧美精英选拔传统阻碍大众化改革，如英、法提高 A-level、Baccalauréat 通过率遭“侵蚀黄金标准”批评；东亚受科举传统影响，形成标准化考试与应试能力路径依赖，日本未能淡化外在动机，韩国应试减负改革受阻。后发改革国家因制度惯性更易出现“水土不服”，如俄、印改革因本土固守与国际制度冲突未达预期。

文章总结了五重维度的多层耦合逻辑框架。五重变革趋势形成互动循环：内容维度的多元能力考查推动评价维度向教育学立场综合化演进，进而催生组织维度的

多元力量与考试形式共存；社会文化与考试改革的博弈引发文化漂移，正向漂移形成历史进步主义，负向漂移导致路径依赖，历史变迁又反作用于考试内容特征。其中，内容与评价属技术要素，回应“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如何选拔”的事实问题；组织、文化、历史属制度要素，回应“科学选才”“效率选才”“公平选才”的价值问题。技术要素易达成共识，制度要素因区域国别差异显著影响改革效果。

基于国际经验，文章提出了对我国构建现代考试制度的五点启示与建议：第一，探索改革复合逻辑，实现制度全面增效。我国高考改革需超越单一技术视角，统筹知识、技术、组织、文化、历史五重逻辑。如等级赋分制度的选择不仅考量技术合理性，更需兼顾教育组织、文化认知、历史惯性的复合逻辑。新高考作为系统工程，制度设计须全盘考量、综合施策，方能提升改革实效。第二，构建考试组合框架，兼顾科学效率公平。参考国际“知识考查—评价技术—组织形式”多元组合经验，建议**高考**作为全国选拔性考试，保障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历史等基础科目核心素养考查，采用常模参照与计量指标，强化区分度；**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侧重基础能力，采用标准与成就参照，基于课

程目标划线；**大学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探索个性化命题与质性指标，拓展选科自由度；**职教高考**强化技能导向与标准化建设，形成多元考试体系。第三，加强大中教育衔接，支撑高考改革深化。发挥考试对教育的反拨效应，推动中学与高等教育衔接。中学需把握改革机遇，开发情境化、跨学科试题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综合认知与迁移应用能力；全国推广选课走班、分层教学、生涯规划、创新实验室等经验，形成与新高考同向的教育改革。第四，促进社会公平流动，修正功利应试文化。针对东亚儒家文化与科举传统形成的应试机制，一方面通过专项计划、选科指引、生涯规划教育为弱势家庭提供支持，破解选科与综合素质评价的不平等风险；另一方面发挥高考社会权重，构建破解功利应试的文化认可机制，引导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观与考试观。第五，理性施策高考改革，兼顾历史承继创新。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基础教育改革趋势，以综合素质化选育与招考多元化为重点，重构公平、效率、科学等核心概念。同时正视路径依赖现实，以渐进路线化解新旧制度冲突，如通过“3+1+2”模式、科目保障机制等优化改革，推动新高考持续深化。（原文刊载于《教育发展研究》2025年第5期）

破解中国高考复杂困局：教育测量学创新与协同改革路径

张敏强、梁正妍、姚敏（华南师范大学）

本研究基于新高考改革实施十余年的实践，系统剖析中国高考制度面临的复杂挑战：第一，两端高校生源两极分化困境。以“双一流”为代表的高端院校对拔尖人才争夺激烈，录取竞争延伸至学术能力、创新潜力等综合素质要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职院校因社会观念偏好“上好大学”及本科扩招冲击，招生连年遇冷，“招生难”已成为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第二，“淡化分数”

构想与平行志愿“分分计较”的现实矛盾。2014年改革方案旨在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通过选科自由、等级赋分、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等方式打破“唯分数论”。然而，社会公众对客观分数的高度信任及对主观评价公平性的担忧，使得各省普遍采用的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实际上将分数的筛选作用推向极致。第三，现代教育测量学面临兼顾常模参照与标准参照的难题。当前高考包含全国统一命题的常模参照测

考试(语数英)和各省自主命题的等级考。学业水平考试本属标准参照性质,但实际计分方式又赋予其常模参照特征,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单一参照体系的混合模式。准确解释和评价这一复杂体系,亟需发展适宜国情的创新性教育测量理论。第四,新高考内容改革对学生备考和教师指导的新挑战。命题强化应用性、探究性与开放性,注重思维品质与关键能力考查,使传统“刷题”和死记硬背的备考模式难以为继;选科改革则要求教师额外承担指导学生选科与志愿填报衔接的工作,需密切关注高校招生政策变化,避免学生因选科不匹配导致滑档风险。

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多维度协同改革的优化路径。第一,双轨并进:重构高校定位与育才范式。高端院校需打破师资研究方向对专业设置的束缚,建立需求导向的动态优化机制:开辟快速通道布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新兴学科;巩固优势学科竞争力并促进交叉融合;果断缩减或暂停就业低迷专业的招生,实现资源优化重组。高职高专院校则须彻底扭转模仿本科的“压缩饼干”式办学模式,建立区域及行业人才需求预警系统,矫正过度依赖低成本“轻专业”的倾向;构建“招生—培养—就业”全链条联动机制,深化校企协同育人,确保人才培养规格与岗位能力无缝对接;教育主管部门需将服务区域产业契合度及毕业生就业质量作为核心评估指标,强化类型特色定位。第二,构建“选拔—识别—培养”三位一体的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新机制。在高校选拔端,赋予高水平大学在优势学科和基础学科领域适度招生自主权,建立融合学业基础、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实践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多维评价体系;录取后协同高中设计贯通式培养方案,探索“本—硕—博”贯通项目,搭建早期科研平台。在高中识别与培育端,强化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关键能力,通过系统培训掌握

青少年发展心理学、科学测评工具应用及生涯规划指导技能,培养识别拔尖创新潜质(如好奇心、深度思考、解决问题韧性等)的“慧眼”,建立潜质学生早期发现、追踪和推荐机制。同时,深化高中课程与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等核心素养,激发其对基础学科的浓厚兴趣。第三,建立融合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的创新性教育测量模型。基于项目反应理论(IRT)的潜在特质分数可提供精准评价并实现跨组比较;聚类分析则能以考生为中心,根据作答反应将其划分为不同能力类别,契合教育考试评价本质。为此,研究提出两种方法:一是基于混合项目反应理论模型(MixIRT)的“一步法”,将考生反应概率同时取决于连续特征分布(IRT模型)和离散特征分布(潜在类别模型),以混合广义部分评分模型(MGPCM)为例,可同时获得考生能力类别和具体能力量化值;二是基于KAMILA算法的“三步法”,即先聚类确定能力类别,再估计具体能力值,最后通过等值校准统一量尺。实证研究表明,这两种方法均适用于“等级考”,能有效建立兼具标准参照与常模参照特性的评价标准。第四,利用人工智能(AI)赋能高考全链条。在招生规划层面,AI通过挖掘市场人才需求、区域产业趋势等大数据,动态预测专业需求缺口,为招生计划制定提供精准支撑;在命题环节,通过分析历年试题知识点、难度、区分度等,辅助优化试题设计,提升考试信度与效度;在考试安全层面,智能监控系统融合人脸识别、行为分析等技术,实现全过程无感监管,筑牢公平基石;在考生服务层面,智能测评系统可生成个性化学科能力画像与专业适配报告,辅助选科决策,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则通过模拟投档和智能匹配,降低滑档风险,提高录取满意度。(原文刊载于《教育与考试》2025年第4期)

【三、高中育人方式变革】

新高考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教育教学的变革与应对

王新风（北京师范大学）

本文基于对新高考改革省份部分高中教师、学生和高校教师等多方利益群体的访谈资料,系统呈现新高考新课程对高中教育教学带来的变革与挑战,并提出改进对策。

文章系统梳理了新高考新课程的改革进程。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一直同向而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1—2012年)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率先启动”阶段。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精神、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并为考试招生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第二阶段(2013—2019年)为“高考改革与课程改革同向而行”阶段。201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同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倒逼高中育人理念、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及管理机制变革。2017年教育部印发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2018年印发《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统筹规划课程改革、高考综合改革和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推动课程、教材、教学、考试、评价、招生的有效衔接。第三阶段(2020年至今)为“教育评价改革牵引综合改革”阶段。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针对党委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主体分类分层明确教育评价改革实施路径。同年教育部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学科课程标准,突出强调教材编写、课程教学、考试

评价都围绕核心素养展开。

文章深入剖析了新高考新课程推动下高中教育教学的四大变革:第一,从应试向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转变。随着基础教育课程理念从“双基目标”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的演进,以及2020年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考查内容和“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考查要求,高中教育教学亟需更新观念,确立学生主体地位,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变。调研显示,新高考新课程倒逼高中教师扭转应试化、套路化教学模式。第二,从注入式向启发式转变。新高考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探索实施探究性学习、合作式学习、项目化学习,教育教学从注入式向启发式转变,从满堂灌向自主学转变,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教师更加注重教学的整体性、延展性等能力培养,考试内容也不再局限于课本,更偏向社会实践与实际问题解决。第三,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新高考“3+3”“3+1+2”科目设置提供至少12种科目组合,高中因地制宜实施不同程度走班选课,满足学生发展兴趣特长需要。新课程优化课程结构,增设通用技术、信息技术等新兴课程,拓展选择性课程,强化综合实践课程,开发校本课程,构建必修、选修、实践并重的多元课程体系,并提供宽口径、多样化的成长路径。第四,从封闭性向开放式转变。高考倒逼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新教材成为新课改的重要抓手,通过内容呈现方式改变促进教与学的行为改变;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考试院、高中教师、高校教师协同参与,各省命题能力稳步提升,大中衔接

能力显著增强。

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了当前高中教育教学面临的四类挑战。一是高中教师难以适应新的命题风格。新高考命题强调情境化、开放性和综合性,但长期依赖“题海战术”的教师对新型命题理解不深,教学设计仍以知识点覆盖为主;题型变化叠加课程改革,使教师倍感压力;部分学科创新性试题在教材和教学中缺乏必要铺垫,学生难以适应。二是高中生尚未完全适应新的教育评价方式。学生长期依赖“题海战术”,难以适应能力导向的开放性试题;备考压力下自主探究空间被压缩,学习动力不足;部分学校仍以学科成绩为核心,学生表达能力、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短板明显。三是高中教师教学难以适应新课标新教材。教材更新频繁、难度提高,教师难以及时跟进;新课标对学科关键能力要求高,但课标解读、教材呈现、课堂训练缺乏具体指引;县域高中和薄弱高中教学资源不足,生源基础差异大,难在统一课标下兼顾个性化需求。四是高中教育教学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脱节。学生选科和志愿填报存在功利性和盲目性,生涯规划指导针对性不强;重理论轻实践、重应试轻能力,应用实践和动手能力培养不足;高校教师普遍不了解高中教学内容调整,课堂教学与高中存在脱节,且各地教材差异加大高校基础课程统一教学难度。

最后,文章提出了四项应对策略。第一,建立“教—学—评”一致性机制,强

化命题与教学的协同性。构建命题与教学联动机制,完善教研员驻校研修制度,推动教研员与高中教师定期交流,建立命题研讨工作坊,以评促教,完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开发情境化试题库。第二,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开发分层分类教学资源。对新手教师开展“新课标解读+基础教学技能”培训,对骨干教师侧重“学科前沿+跨学科教学能力”提升;针对实验教学联合高校实验室开展实操培训;建设区域共享资源库,开发适配性教学资源,为薄弱高中定制低起点、慢节奏的实验微课等。第三,构建大中衔接课程框架,推动教材内容标准化。开发预修衔接课程,在条件具备的高中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并与高校学分互认;系统梳理高中与大学学科核心能力对应关系,共建学科能力图谱;制定国家或地方层面学科核心内容框架,梳理教材核心知识点清单;强化实验与实践课程,必修实验课程刚性化,完善校企合作实践基地。第四,构建大中衔接的生涯规划教育体系,引导学生自主发展。聚焦专业选择和能力匹配,加强学科专业选择指导及职业发展态势认知;强化生涯指导专业支持,有条件学校配备专业生涯指导教师并纳入教师编制;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学校普及选科策略;建立学生选科动态调整机制,允许根据学习情况调整选科,配套学科适应性测评工具。(原文刊载于《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

高考改革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研究

刘海峰、朱沛沛(浙江大学、南昌大学)

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全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中4432份大学生开放题有效答卷进行分析,探讨高考综合改革如何通过高考试卷、选科制度、综合素质评价三类政策工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本文将高考改革政策工具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作用关系对应为三个层面:高考试卷对应强制性政策工具,发挥“约束”作用;选科制度对应混合性政策工具,发挥“塑造”作用;综合素质评价对应自愿性政策工具,发挥“牵引”作用。

研究发现,高考试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存在局限:德体美劳四育难以统一测量,体育能力与个人先天身体条件相关且个体间差异很大,德育内隐性、美育个体差异性、劳动教育的实践性使其难以量化,“思想政治题只体现试卷答案,部分学生言行不一”;德体美劳四育纳入试卷考核易造成应试教育,“加重学生负担”,“促进全面发展不代表应全部纳入考试”。高考具有强大的以考促学功能,过度依赖考试则易导致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走向片面应试。但高考试卷可为之处显著:智育能间接促进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发展,如“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体育兴趣、培养审美素养、增强劳动意识;需提升智育考核质量,通过提高命题立意、优化试卷结构、增加题目和注重核心素养的考查等举措,践行五育融合理念,避免“考题越来越复杂”“试题对农村孩子不友好”等不公,在保障公平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命题的科学性。

选科制度需配套与优化。配套方面,应加强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包括选科指导、志愿填报指导(让学生更多了解各专业)、自我探索(超越以考试分数和排名定义学生的简单做法)和职业规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指导能力以免影响“学生培养质量”,应对选课走班下“非高考核心科目教师边缘化”及农村学校“指导有限”的问题。优化方面,需完善

赋分机制,解决“顶尖考生选考成绩几近满分”的区分度降低、赋分过程中可能产生分数差距扭曲及“田忌赛马”式投机选科问题;**调节招生计划**,应对“3+1+2”模式下物理组计划远高于历史组导致的历史科目组的考生升学竞争激烈,所能选择的高校专业空间受到压缩,招生计划配置与学生选科之间出现失衡的问题。

综合素质评价面临城乡与家庭差异问题:城乡间“偏远地区学校缺乏教学能力与硬件”,导致“偏远地区学生输在起跑线上”;家庭间艺术素养培养“大多数人花不起钱”,被视为“为权势阶层服务”。其完善需在内容层面充分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学校资源和成长环境差异,鼓励并认可处于劣势地位学生跨越困境的勇气和毅力,“全面客观地记录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发展的水平与亮点”;实施层面厘清政府、高校与高中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加强综合素质评价实施过程中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健全监督机制。

基于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努力把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促进三类政策工具的目标一致。第二,合理使用高考试卷、选科制度、综合素质评价三类不同效力的政策工具,增强三类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第三,正确认识高考改革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优化三类政策工具的作用边界。(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2期)

新高考综合评价招生实践探索:成效、挑战及展望

韩子祥、王新风(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团队基于2024年对改革省份五类群体(高中教师、学生、家长、高校教师、学生)的201308份有效问卷及317人次实地访谈数据,系统评估综合评价招生的实施效果,以为优化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文章梳理了综合评价招生的制度发展历程,政策溯源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高校分类发展与招生自主权扩大阶段。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序幕,1998年《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招生自主权。2003年教育部批准22所高校试行自主招生,为综合评价招生奠定了实践基础。二是基础教育改革与素质教育实施阶

段。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加快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突出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2007年,中南大学率先实施综合评价招生,2011年,浙江省建立“三位一体”评价体系,标志综合评价招生理念形成。三是高考综合改革全面推动阶段。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列为改革方向。2014年《实施意见》启动新一轮改革,将“两依据一参考”作为重要内容。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要求健全综合评价,使其成为教育评价改革的一项机制创新。

在制度特点方面,综合评价招生从广义上指采用多种方式对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进行全面评价;从狭义上指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核心是将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高校自主测试成绩等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其特点表现为:政策目标强调适应高校专业需求的综合选才;实施主体覆盖院校层次更广;选拔标准注重综合素质;招生专业无特殊限定,仅少数高校采取单独编班或导师制。

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实证数据系统呈现了综合评价招生的实施成效。研究发现,相关群体对综合评价招生模式的认可度达94.8%,其中高校学生认可度最高(95.9%),高中教师相对较低(87.2%)。

在制度建设成效上,首先,总体认可度高,实践经验持续推广。高校视其为丰富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高中借此增强过程评价意识,学生与家长则认为其提供了多元升学渠道。其次,招生目标基本达成,选才成效显著。95.9%的调查对象认为其增加了入学机会,94.4%认为有利于选拔高素质学生,95.1%认为克服了“唯分数”弊端。再次,招生程序不断规范,保障公开公平公正。已形成全过程、全要素、全层次的组织体系。

在学生发展成效上,首先,学业表现

更优。尽管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学生的高考成绩普遍低于统考生,但学习适应性显著更高。其次,综合素质更强。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坚毅性四个维度显著优于统考生,创造力成长型思维与成就动机也呈现更高均值。最后,专业认同度更高。综合评价招生强调专业导向,学生在报考前已对专业有充分了解,职业意向更明确,转专业比例更低,研究生保送率也高于平均水平。

然而,文章指出综合评价招生面临公平性、科学性与效率的多重挑战。第一,教育资源分布差异产生公平性隐忧。综合评价招生的报名条件与面试考核更有利于家庭条件优越、见识广泛的学生;面试环节易受家庭背景影响,弱势家庭学生可能因“包装”不足处于劣势。第二,相关群体的功利化选择影响制度成效。部分学生将其视为升学捷径或保底手段,高中将其作为提高升学率的工具,高校则用于提前锁定生源。这种功利化导致“报考火热、录取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第三,招生科学性有待提升。部分高校缺乏专业招生队伍,评价指标权重失衡;过于强调高考成绩或证书奖状,割裂了高中与高校综合素质评价的联系;校测内容同质化,难以反映学生真实素质,存在初审侧重学业、校测侧重素质的错位现象。第四,高中政策宣传与指导力度不足。部分高中对政策解读不充分,生涯规划教育缺位,导致校外培训机构借机夸大宣传,反映出高中专业性资源保障的不足。

最后,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建议举措。一是保障教育公平,稳步扩大招生规模。增加教育资源投入,提升县域高中办学质量,坚持机会公平;在招生计划、报名条件、校测环节减少家庭背景影响,对弱势群体子女给予补偿与倾斜;在确保公平前提下,稳步扩大招生规模和试点范围。二是发挥主体协同优势,缓解功利应试倾向。教育行政部门引导学校扭转不科

学评价导向；高中克服应试教育影响，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建立非学术性素质指标体系；高校将过程性评价纳入招生体系，处理好学业表现、竞赛成绩与综合素质的权重关系。三是落实自主招生权，提高人才选拔效率。教育行政部门保障高校招生自主权并建立监督机制；高校提升校测环节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处理好综合素养与学科特长的关系；建立专业化招生队伍，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突破单一笔试与结

构化面试形式，采用开放性试题、技能考核等多元方式选拔人才。四是规范校外培训服务，加强高校与高中衔接。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限制其功利性渗透；高中加强生涯规划体系建设与学生发展指导，发挥育人主阵地作用；政府与高校协助高中加强政策宣传，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明确选拔指向。（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5年第2期）

【四、高校端变革与公平审视】

新高考背景下高校专业发展的演变、挑战及其应对

李金波、苏胜（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师范大学）

本文以浙江省为样本，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梳理新高考背景下高校专业招生的变革轨迹，剖析专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

文章系统阐述了新高考对高校专业招生的四项核心改革。第一，专业招生模式趋于多样化。浙江构建了“四位一体”的选拔体系：统一高考招生、三位一体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并辅以强基计划、高校专项等通道，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高校招生“立交桥”。第二，专业录取标准由唯分数向综合评价转变。改革确立了“两依据、一参考”的多维度评价机制，破解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使录取“见分又见人”，体现了更深层次的实质公平。第三，专业选报由“学校+专业”向“专业+学校”转变。改革取消录取批次，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大幅增加专业志愿数量，彻底解决了“服从专业调剂”的难题，确保学生录取至心仪专业。第四，实施本科专业选考科目指引。教育部先后于2018年、2021年发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和《通用版》，明确了各专业类与选考科目的绑定关系，强化了专业与学科的关联性。

文章分析了新高考驱动下高校专业

发展的四大演变趋势：第一，专业结构布局发生调整。按专业投档加剧了专业间竞争，倒逼高校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道路。第二，专业生源结构呈现多元化。选拔模式上，高职院校通过单独考试、高职提前招生录取的专业数已超过普通高考，且同一专业生源可来自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的不同类别。选考科目上，不同层次高校新生学科背景差异显著：“双一流”高校理工科专业物理、化学选考率高，而高职院校新生偏文科目（政史地、技术）选考比例高，物理、化学选考率极低。第三，专业间录取分差持续拉大。取消批次壁垒后，高校竞争转为专业直接对抗。统计显示，从“双一流”到一般本科，校内最高分与最低分专业的分差较改革前显著扩大，且呈逐年递增趋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凸显。第四，专业认同度与忠诚度显著提升。调查显示，超八成学生认为新高考提升了专业兴趣与认同度；专业平行志愿消除了调剂生，使新生专业思想更稳固，转专业意愿显著低于其他省份。

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了当前高校专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是专业结构布局有待优化，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与产业契合

度不足,“四新”专业建设滞后,资源分散导致特色不彰。二是生源多元化对人才培养提出新挑战,尤其高职院校理工科专业新生选考物理比例极低,出现生源学科基础与专业培养要求错位的问题。三是专业分差拉大要求高校提升招生能力,需从“校系脱节”转向协同招生,从“宣传学校”转向“推介专业”。四是专业与选考科目的匹配度有待加强,高校设置选考科目的自主权相对较小。

针对上述挑战,文章提出四点应对策略。第一,持续优化专业结构布局。推进大类招生与宽口径培养,建立灵活的转专业机制;强化内涵建设,建立“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依据报考率、就业率等数据实施专业动态调整;鼓励设置文理交叉专业,推动传统专业数字化转型。第二,适应生源多元化,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本科院校应肯定文理交叉生源的优势,优化培养方案;高职院校需针对生源学科基础薄弱的现状,强化通识教育,实施差异化教学,并加强对高中生的生涯规划指导。第三,适应分差拉大趋势,高校要“学会招生”。将招生工作下沉至院系,组建由专家学者参与的招生队伍,从专业视角制定选拔标准;改革宣传方式,由突出学校品牌转向彰显专业特色,深入中学开展精准宣讲。第四,深化专业招生机制改革。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扩大高校在设置选考科目上的自主权,实现相同专业在不同高校间的差异化选拔;加快人工智能在考试招生中的应用,探索从“一档一投”向“一档多投”转变,从根本上缓解专业与生源匹配度不高的问题。(原文刊载于《教育发展研究》2025年第5期)

新高考投档方式改革是否加剧高校内部专业生源质量的两极分化?

吴宇川、丁延庆、许锐、李菊(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本文以2016—2021年全国18个省份的高考录取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系统考察新高考投档方式改革对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

文章系统阐释了“改革—考生行为—生校匹配”的理论传导机制。上一轮高考改革遗留的专业调剂风险、退档风险、滑档风险,使考生在志愿填报时需承担保守填报行为。新高考投档方式改革通过取消或缩小调剂范围、明确投档比例不超过100%、大幅增加可填报志愿数量,显著降低了上述三类风险,从而释放了考生的院校与专业偏好,减少了保守填报行为。经由双边匹配框架分析发现,“考生—院校”匹配质量的提升倾向于缩小平均院校生源质量范围,是阻止高校上下限差距扩大的力量;而“考生—专业”匹配质量的提升倾向于扩大专业生源质量差距,是推高高校上下限差距的力量。由于两种影响机制同时存在且方向相反,高校上下限差

距的最终变化方向取决于两类匹配变化程度的对比,理论分析无法定性判断,必须依赖经验证据回答。

在此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实证分析结果。平行趋势检验显示,改革前各年估计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专业组”与“专业”两个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新高考投档方式改革的平均政策效应表现为对高校上下限差距没有显著影响,改革并没有加剧高校内部专业生源质量的两极分化。从控制变量看,上一年下限专业生源质量对当年上下限差距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与高校录取“大小年”现象有关;考生人数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0,说明竞争越激烈,高校上下限差距越小;可填报志愿数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考生—院校”与“考生—专业”两类匹配的变化程度相当;“单批次”“双批次”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

小于0,说明批次合并能缩小上下限差距;“双一流”高校回归系数显著小于0,可能与入选“双一流”的身份效应提升院校录取最低分有关;高校所在省份上一年GDP越高,上下限差距越大。稳健性检验方面,一是将生源质量衡量指标由省排名改为省排名比例,二是将样本按改革模式分组回归,结果均与基准分析保持一致,核心变量回归系数仍不显著。

进一步,文章开展了拓展性分析。第一,考察上下限专业生源质量各自的变化。以高校上下限专业录取最低分对应省排名为因变量分别回归,结果显示两种改革模式下“专业组”“专业”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小于0,说明两种投档方式改革均显著提升了上下限专业的生源质量,且系数差异检验表明“专业”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专业组”,即专业平行志愿改革的提升效果相对更强。第二,考察改革在不同高校群体中的异质性影响。将样本分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双非”高校两个子样本分别回归。结果显示:在高校上下限差距维度上,两类高校的两个核心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无论哪种改革模式对两类高校的上下限差距均无显著影响;在上限与下限专业生源质量维度上,“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两个核心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而“双非”高校的两个核心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小于0,且系数差异检验显著、“专业”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专业组”。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以提升上下限专业生源质量为政策目标,专业平行志愿是更好的选择。

研究结论认为:第一,从平均政策效应看,新高考投档方式改革并没有加剧高校内部专业生源质量的两极化,理论层面“考生—院校”与“考生—专业”两类匹配方向相反的机制变化在现实中制变化在现实中程度相当。第二,两种改革模式均显著提升了上下限专业的生源质量,且专业平行志愿改革的提升效果相对更强。第三,改革对不同高校群体生源质量的影响不同,若以提升上下限专业生源质量为政策目标,专业平行志愿是更好的选择。

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两点政策建议。第一,各省在选择投档方式改革模式时,应综合考虑对下限专业生源质量与考生选择权的保护,以及考生与高校匹配质量的提升。从保护下限专业生源质量与考生选择权的角度,专业平行志愿更具优势;且其没有调剂风险、退档风险极小,更有利于考生保守行为的减少以及生校匹配质量的提升,从而更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第二,应规范高校“以热带冷”策略工具的使用,防止改革成本的浪费。高校为保护冷门专业、防止下限专业生源质量下降,常以大类招生和灵活设置专业组方式将冷热门专业“捆绑销售”,部分高校甚至刻意压缩校内专业组数量,此种情况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规范高校“以热带冷”的策略行为,让相关规则的应用回归初心。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

【五、主体体验与微观实证】

新高考改革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吗?

——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覃红霞、高玉勤、陈雯馨、张金丹(厦门大学、宁波工程学院)

本文利用全国31个省(区、市)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高考改革对学生综合素

质及其智育、非智育两个维度的净效应,并剖析其异质性与边界条件,为新高考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文章梳理了综合素质的内涵测度、新高考与学生综合素质的关系,以及综合素质发展的影响因素。在概念层面,将综合素质分为智育(学业水平与学术表现)与非智育(德体美劳等要素)两个维度。在改革关系层面,传统高考以文化课成绩评定学生,衍生出“唯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等弊端,五育失衡问题突出;新高考通过选科制、综合评价、生涯规划教育等措施,意在扭转这一局面,但其实际效果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在影响因素层面,既有研究从学校环境、家庭资本、个人特质三个维度展开,但针对新高考背景下这些因素如何调节改革效应的研究仍属空白。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2年“关于高考改革的调查(高中生卷)”。核心被解释变量为综合素质(含智育、非智育两个子维度),核心解释变量为渐进DID变量(省份一年份层面是否实施新高考)。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质(性别)、学校环境(优质高中vs普通高中)、家庭资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家庭SES指数,将前25%定义为优势阶层、后25%定义为弱势阶层)。学习投入作为调节变量,由“保持积极学习态度”“对学习充满热情”等题项构成,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在此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实证分析结果。第一,基准回归证实新高考改革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改革对高中生综合素质具有稳健的正向提升作用,对智育的提升效果明显优于非智育。第二,稳健性检验支持结论可靠性。

在异质性分析方面,学校环境维度显示,新高考对优质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系数为0.055($p<0.05$),对普通高中学

生为0.115($p<0.001$),后者获益更大。家庭资本维度显示,优势阶层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系数为0.085($p<0.01$),弱势阶层为0.053($p>0.05$),前者获益更明显。

在调节效应方面,学习投入对学校环境和家庭资本均呈现“选择性补偿”特征。对于学校环境差异,学习投入对优质高中和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普通高中学生通过学习投入获得的提升略强。对于家庭资本差异,学习投入对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学生的综合素质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示学习投入对缩小阶层间综合素质差距的补偿效果均不显著。

文章总结了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研究表明:第一,新高考改革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其智育、非智育两个维度,但智育提升幅度大于非智育,说明非智育发展仍需进一步优化。第二,改革效果存在群体不平衡性: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效果优于优质高中;同时,优势阶层学生的提升效果优于弱势阶层,印证了家庭资本在改革中的放大效应。第三,学习投入具有“选择性补偿”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校环境差距(尤其体现在非智育维度),但对弱势阶层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补偿效果不明显,反映出单纯依靠学习投入难以突破家庭环境限制的现实困境。

基于此,文章提出未来新高考改革应进一步关注弱势阶层学生,强化针对性扶持措施,以缩小群体差距,真正实现改革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制度初衷。

(原文刊载于《全球教育展望》2026年第4期)

学校生涯规划指导如何影响学生高考选科 ——基于双因子模型的实证研究

朱沛沛、刘海峰(南昌大学、浙江大学)

本研究以浙江省九所普通高中1201名学生为样本,构建学生对学校生涯规

划指导认知的双因子模型(整体认知全局因子与学业发展、职业发展、个人/社

会发展、大学准备四个局部因子），系统检验其与选择文理交叉科目组合意向之间的关系，旨在丰富本土高考改革与生涯规划指导关系理论，并为优化学校指导服务提供实证支撑。

文章梳理了文献脉络并构建研究框架。在学生高考科目选择方面，新高考通过“3+3”“3+1+2”等模式打破文理壁垒，科目组合增至12—35种，为学生提供更广泛选择空间。在影响选科的情境因素方面，理科存在制度与文化偏好，理工类专业就业前景更好；学生选科常受功利主义驱动，出现“物理遇冷”“化学遇冷”等“田忌赛马”现象；家庭资本（城乡身份、母亲受教育程度）、学校环境（课程设置、教师指导）等均有显著影响。在学校生涯规划指导维度方面，国内实践概括为学业发展、职业发展、个人/社会发展和大学准备四个核心维度，分别源自美国学校咨询协会国家标准与大学理事会大学准备框架。本研究提出双因子模型：学生感知的学校生涯规划指导并非四个独立维度的简单叠加，而是存在高度相关性的整体，需通过全局因子（整体认知）与局部因子（四维具体认知）共同拟合。基于此，研究假设整体认知与四维认知均与文理交叉选科意向显著相关，并构建潜在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学生对学校生涯规划指导的整体认知与选择文理交叉科目组合意向呈显著负相关；第二，四维具体认知（学业发展、职业发展、个人/社会发展、大学准备）与文理交叉选科意向均无显著相关，说明学校生涯规划指导对学生选科的影响以整体方式而非单独维度发挥作用；第三，学生特征差异显著：女生比男生更可能选择文理交叉组合；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选择概率高约24.6%；高三年级

学生选择概率是高一年级的1.221倍，高二年级无显著差异；母亲受教育程度与独生子女状态影响不显著。

基于实证分析，文章提出研究结论认为：学校生涯规划指导的整体性至关重要，仅关注单一维度难以有效促进学生选科多样化；学生对指导支持感知越强，越倾向于选择传统文理分科组合，这可能与2021年《选科指引（通用版）》强化“物化捆绑”有关：顶尖高中依托资源优势维持理科传统，非顶尖高中因资源限制多采用“套餐制”，弱势学校学生为获取高分更倾向选择文理交叉组合（如搭配技术科目）；农村学生、女生、高三年级学生构成文理交叉选科的主要群体。

文章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注重学校生涯规划指导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学生发展是整体过程，选科需整合自我兴趣、社会需求、职业前景与大学要求。应避免将指导狭隘化为升学指导或分数指导，需统筹学业、职业、个人/社会与大学准备四个维度，构建有机协调的完整体系。第二，增强学校生涯规划指导与高考综合改革的耦合。当前指导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存在制度缺失（无统一标准）、资源不足（专职教师短缺）、区域失衡（地市间差异大）等问题。应以改革为契机，建立匹配新高考的指导制度，明确内容与指标，加强师资专业化建设，全面培养学生选择素养。第三，实施中有针对性地照顾个体差异。需基于学生背景差异（性别、居住地、年级）提供包容性指导，利用科学测评工具识别不同群体需求；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选科大数据辅助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专业匹配、路径规划服务，帮助其找到适合的发展道路，顺利完成高中到大学及社会过渡。（原文刊载于《全球教育展望》2026年第4期）

【学术动态】

省教育考试院首场课题季度交流会召开

为强化在研课题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切实提升课题研究质量与成果转化效能，省教育考试院自 2026 年起建立课题季度常态化交流机制。5 月 9 日，首场课题季度交流会在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5 年度 7 项省级委托专项课题主持人参会，共同开展阶段性复盘与研讨交流。

会上，各课题主持人详细汇报了研究进展、存在困难及下一阶段计划。在交流研讨环节，与会人员紧扣研究路径优化、核心数据采集分析、成果转化应用及难点攻坚等议题，深入交流经验、积极建言献策。现场讨论热烈、务实高效，有效实现了经验互通、优势互补，为后续课题高质量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会议还就全院数据规范化管理、优秀科研成果遴选推介等工作进行了通报。下一步，科研处将依托课题季度交流平台，持续深化学术研讨、问题会诊与经验共享，全面提升科研工作质效，以高水平科研赋能全省教育招考事业高质量发展。

【域外资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无与伦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2026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高度评价中国高等教育过去 25 年的跨越式发展，称其为“无与伦比的扩张”。

一、高等教育的快速大规模扩张。据报告，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74 年的 0.3% 提升至 2024 年的超过 60%，这一成就仅用 25 年就从低收入国家平均线跨越至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有望在 2028 年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值。24 岁以下青年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也从 2000 年的 6% 升至 2020 年的 41%。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始于 1998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将高等教育定位为服务国家经济战略的重要工具。1999 年起，高校招生规模连续大幅扩张：1999 年增长 47%，2000 年增长 38%，2001 年增长 22%。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 1990 年的 390 万激增至 2024 年的 6100 万。

二、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与分层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并非简单规模扩大，而是通过多样化和分层实现。2023 年，在校生中普通本科占 34%、职业教育 29%、成人教育 17%、网络教育 13%、研究生 7%。职业院校吸纳了大量增长，尤其在中西部省份。中央政府则重点支持顶尖大学，通过“211 工程”“985 工程”及 2015 年启动的“双一流”建设，集中资源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

报告同时呈现了资金结构的演变：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占比从 1998 年的 60% 降至 2006 年的 34%，学费一度成为重要补充；之后通过监管控制学费，政府投入占比回升至 2015 年的 68%。省级政府在扩张中承担了主要责任，负责设立和管理大部分高校。

三、公平导向的政策努力。尽管城市—农村的区域差距依然存在，报告特别肯定了中国为促进教育公平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国家专项招生计划等优惠政策已帮助 110 多万名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包含 28 个国家级项目，2023 年发放 1850 亿元人民币资助。

报告也提到未来挑战,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许多高校可能面临合并或关闭压力,未来需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就业导向。同时,城乡之间尤其是精英大学准入方面的质量差距仍需持续关注。UNESCO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大众化经验为全球提供了重要参考,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国家战略、多元化供给和公平干预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摘编自“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公众号)

法国公布 2026 年中高考系列改革方案

法国国民教育部近日公布了 2026 年国家考试(初中毕业会考及高中毕业会考)的全新改革方案。本次改革涵盖初中毕业会考(简称 DNB)、普通与技术方向高中毕业会考以及职业高中毕业会考,旨在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真实水平、提升文凭价值,并加强考试公平性。超过 150 万名考生将受到新规影响。

1. 初中毕业会考: 期末成绩占比升至 60%, 数学考试分为两大板块。2026 年起,法国初中毕业会考的评估方式发生重大调整。此前,平时成绩与期末笔试各占最终成绩的 50%; 新规下,期末笔试权重提升至 60%,平时成绩降至 40%。平时成绩的计算方式也同步更新:不再沿用过去基于“共同基础”掌握程度的积分制,而是直接采用初三学年各科年度平均分的平均值(每门必修课系数为 1),选修课超过 10 分(满分 20 分)的则作为额外加分项。

数学考试迎来结构性变革。考试总时长仍为 2 小时,但明确拆分为两个独立部分:第一部分“计算自动化”时长 20 分钟,满分 6 分,不允许使用计算器,重点检验学生的基本计算能力;第二部分“推理与问题解决”时长 1 小时 40 分钟,满分 14 分,允许使用计算器,内容为相互独立的综合应用题。无论哪一部分,推理的清晰度、准确性及书写质量都将被单独评估,占 2 分。此外,科学考试中随机抽取的两个学科

(2026 年为物理—化学与生命和地球科学)的成绩将分别显示在成绩单上,便于考生了解细分领域的掌握情况。

2. 普通与技术高中毕业会考: 高二增设数学提前考试, 限制评审团加分。普通和技术方向高中毕业会考在 2026 年迎来多项重要革新。最引人注目的是,从 2026 年 6 月起,所有高二学生(无论是否选修数学专业)都必须参加一门全新的数学提前考试,成绩计入 2027 年高考总分。该考试时长 2 小时,满分 20 分(系数 2),全程不允许使用计算器。试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多项选择题,评估计算自动化,占 6 分;第二部分为两到三个独立练习题,占 14 分。针对不同数学学习路径,教育部设置了三种试题:普通方向选修数学专业的学生使用一种试题,普通方向未选数学但学习科学课程中包含数学的学生使用另一种,技术方向学习共同基础数学的学生使用第三种。该数学提前考试成绩将与法语提前考试成绩一同纳入 Parcoursup 高等教育入学平台。

另一项技术方向的改革涉及 STI2D(工业与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类学生。自 2026 年起,该类高三学生的“工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专业考试中增加 2 小时实践环节。考生需基于学校提供的产品(建筑、模型、系统或子系统)进行模拟和实验,提出解决方案、解读结果或验证技术选择。

在文凭授予环节,为保证全法范围内平时成绩的公平可比,每所学校须在学年初期制定校内评估方案,并提交学校理事会审议。在高二和高三学年结束后,大学区将组织由教学督察和教师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对平时成绩进行跨校比对与必要调整。新规还对评审团加分设置了上限:审议委员会最多只能授予 50 分奖励分,即平均分最高提高 0.5 分;第一轮考试后成绩低于 8 分(满分 20 分)的考生将无法获得任何加分,也无资格参加补考。此举旨在确保文凭真正反映学生的实际能

力,延续了2024年取消初中毕业会考成绩修正的做法。

此外,所有学科的全​​国评分标准将明确强化写作质量(拼写、句法、语法、语言清晰度)和推理能力的评估。任何因语言表达严重不足而导致试卷无法阅读的考生,将被给予低于平均分的分数(享有特殊考试便利的残疾考生将获得专门处理)。

3.职业高中毕业会考:考试时间提前,新增多个专业。职业高中毕业会考在2026年迎来时间表调整和专业扩容。笔试时间从往年的六月中旬提前至5月20日至6月5日(部分地区延至6月9日)。所有考生共同的“预防—健康—环境”考试定于6月1日举行。期末项目口试则安排在6月24日之后。这一调整旨在更好地保障学习时间和个性化辅导质量。

在专业设置方面,职业高中毕业会考新增8个专业:汽车车身喷漆、网络安全与电子、船舶维护、电力互联环境、光子光学、制药食品化妆品生产、索道运输、公共工程。职业资格证书(CAP)同样新增8个专业,涵盖熟食、巧克力糖果、酒店服务、车辆制造、烹饪、皮具、足球行业及内河运输等。职业资格证书(CS)也增加了“餐厅甜点”和“吧台行业”两个方向。这些新专业旨在回应地方经济需求和行业技术变革,提升职业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认可度。

4.严防作弊:手机探测器全覆盖,可取消整场考试成绩。面对利用新技术作弊案件的增长(2025年记录到1208起,其中833起被提交纪律委员会,634起受到制裁),2026年将进一步加强防范。所有大学区均已配备手机探测器,在笔试期间随机分配到各考试中心。考试规则明确:手机、智能手表等所有通讯及电子存储设备必须关机并放入书包或交给监考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小抄、偷看邻座、与他人交谈、考试开始后第一小时内离场等均属违规行为。

同时,纪律制裁力度加大。根据2026年2月27日的新法令,纪律委员会可采

取精准制裁:取消一门或多门考试(包括期末考试、提前考试、平时成绩、持续过程性考核成绩或补考成绩),在最严重情况下可宣布整场考试季成绩无效。常规行政制裁包括警告、剥夺优秀评语、1至5年内禁止参加任何考试或禁止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注册。刑事处罚方面,冒名顶替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和100万欧元罚款。

5.备考支持:零号样卷、成功强化班、模拟考试全面铺开。为帮助学生适应新考试,法国教育部同步加强了备考支持措施。Éduscol在线平台提供了数学新考试的零号样卷、计算自动化清单及配套指南。初中阶段继续实施“作业完成”在校辅导和春假期期间的“成功强化班”,优先面向优先教育区学生。普通和技术高中每年设有72小时个性化辅导时间,职业方向则重点巩固法语和数学基础。各校还组织模拟考试、方法工作坊等,帮助考生熟悉新题型、管理考试时间。(摘编自“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公众号)

英国高等教育面临人口下降与掠夺性招生双重威胁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EPI)最新发布《人口下降与掠夺性招生:2040年代英格兰高等教育的双重威胁》报告。报告指出,英格兰高校中占本科生生源约80%的年轻人口将在2030年后迅速减少。未来十年内,高校从这一群体获得的收入总量将下降近20%。

然而,这种下降并不会均匀分布。过去十年间,学生学费的实际价值已下降25%至30%。作为应对,英国大学与学院招生办公室(UCAS)认定的“高门槛”院校开始招收学业成绩较低的学生——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学生的成绩远低于此类院校以往的招收标准。如此,“高门槛”院校增加了自身的招生人数,却挤压了本可能入读其他大学的学生群体。

目前,英格兰18岁人口数量仍在增长(并将继续增长四年),部分“非高门

槛”大学也维持了招生数量。但是，当2030年后人口呈现下降趋势，而“高门槛”大学继续其近年来的招生策略时，其他大学将面临招生严峻困境。在报告预测的可能发生的情境中，“非高门槛”大学都将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本科生学费收入将减少25%以上。

报告总结道，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任由市场自行决定高等教育的未来形态，从而接受这样的结果；要么对相关院校的本科生招生施加有限度的限制——类似于1990年代实施的学生数量控制举措。报告呼吁英国学生事务办公室进行内部重组，确保配备具备相应技能和知识的工作人员，为建设一个健康、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履行相应职责。对高校治理机构，报告建议应制定战略，明确将2030年后的人口下行趋势纳入考量。（摘编自“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公众号）

美国哈佛大学治理成绩膨胀现象

近日，哈佛大学教师投票通过一项新政策，将限制本科生成绩中A等级的授予比例，以应对该校长期存在的成绩膨胀问题。根据新政策，单门课程中A等级成绩原则上不得超过该课程所有成绩的20%，同时允许最多额外增加4个A等级名额。该限制仅适用于本科生，对A-及以下成绩不设比例限制。此次投票结果为458票支持、201票反对。

哈佛大学本科教育院长阿曼达·克莱鲍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投票，将有助于强化哈佛的学术文化，也希望鼓励其他高校以同样严谨和勇气面对类似问题。报道称，哈佛大学成绩长期呈上升趋势。根据哈佛学生手册，A等级本应授予表现特别优异的学生。然而，在2024—2025学年，哈佛本科课程中约三分之二的成绩为A；而在2012—2013学年，这一比例仅为35%。

哈佛本科教育办公室曾在去年秋季发布关于成绩膨胀的报告，敦促教师采取

更严格的评分标准。该校自今年2月以来一直在讨论是否对A等级成绩设置上限。根据安排，新政策将于2027学年正式生效，并将在实施三年后进行评估。长期关注成绩膨胀问题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文·平克对投票结果表示支持。他认为，成绩膨胀导致高校陷入“竞相降低标准”的局面，坚持高难度课程和严格标准的教师可能会面临选课人数下降的压力，也使大学的学术评价公信力受到质疑。

该政策在学生群体中并不受欢迎。在哈佛今年一项约800名学生参与的调查中，约94%的受访学生反对或倾向于反对设置A等级成绩上限。许多学生担心，该政策会加剧同学之间的竞争，削弱合作氛围，并增加学生压力、影响心理健康。也有学生认为，成绩限制可能使学生更不愿意尝试不熟悉的课程，从而削弱学术探索的积极性。（摘编自“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公众号）

经合组织：高中毕业生做好上完大学的准备了吗？

2026年5月，经合组织发布题为《高中毕业生为成功接受高等教育做好了多大程度的准备？》的政策简报。该简报通过对多个国家在高等教育过渡与完成情况方面的关键指标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揭示各国在高等教育准备、入学、留存和完成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及其背后的制度与政策因素。

一、高等教育入学申请的成功率与地区差异。尽管世界各地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入学机会大幅增加，但大多数申请者仍能成功入学。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近三分之二的高中毕业生申请者至少被他们选择的一个高等教育项目录取。然而，这一比例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显著。例如，法国的录取率高达95%，希腊为90%，斯洛伐克共和国为86%，捷克为83%，而芬兰仅为41%，瑞典为39%，苏格兰（英国）为34%。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的招生模式：录取率高的国家通常拥有容

量充足的高等教育体系、丰富的短期或职业课程以及较少选择性的招生程序；反之，芬兰和瑞典等录取率较低的国家则更具选择性且容量有限。

二、高等教育阶段的完成率与延迟毕业现象。在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中，按时毕业的比例并不均衡。平均而言，只有43%的学士学位学生能按时毕业；在理论课程结束一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59%；三年后达到约70%。这表明部分学生会延迟毕业，而仍在校的学生中最终完成学业的占比不可忽视。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以及加拿大，延长学习时间并不一定意味着教育失败，因为学习路径更为灵活，间隔年、职业活动或更换项目更为常见。此外，国家兵役政策也影响教育路径，例如芬兰只有37%的男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士学位，而女性为59%。

三、第一学年是高危期，制度设计与财务压力影响学业进展。在完全辍学的学生中，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年是关键时期。正是在此阶段，一些学生意识到所选专业不适合自己的，或难以平衡学习与工作和个人生活。在巴西、哥伦比亚、比利时法语区、卢森堡、秘鲁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和地区，至少五分之一的学生在第一学年内离开高等教育。项目设计中的评估结构也起到重要作用：一些体系在早期设置高风险的筛选考试，快速淘汰未达标准的学生；而另一些体系则将主要评估推迟到后期，可能延迟辍学决定。学费成本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高额学费可能限制部分年轻人的入学机会，但也能促使已入学的学生加快学习进度以减少债务。例如，英格兰（英国）的年学费超过13,000美元，毕业生平均债务为68,000美元，财务压力推动许多学生加速完成学业；而在芬兰或挪威等免费或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学生更愿意休学或延长学习时间。

四、高中生的职业不确定性加剧，职业指导服务不均衡。根据2022年PISA

数据，近39%的15岁学生不确定自己未来想从事什么职业——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中呈上升趋势。即使在有职业规划的学生中，也存在显著的能力与目标错配：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希望从事需要高等教育学历的职业，却不打算在中学后继续升学。这种错配可能导致糟糕的学业选择、后续的重新定向，以及部分学生从高等教育中早期辍学。

在此背景下，提供有效的职业指导至关重要。然而，各国职业指导服务的覆盖程度差异很大。北欧国家和爱尔兰在将合格指导顾问融入高中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无论学校的社会经济优势如何。相比之下，在大多数国家，最弱势的学生更难获得指导服务。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意义上，社会经济弱势学校中的15岁学生与专业顾问讨论学业和职业未来的机会远少于优势学校的学生。在巴西、哥伦比亚、希腊、墨西哥、秘鲁和罗马尼亚等国家，这一差距超过40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国家，其他高中教师也扮演着咨询角色，这提示政策制定者应对教师进行相关技能培训。

五、部分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针对上述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尝试采取行动。例如，比利时弗拉芒语区的“哥伦布工具”帮助高中生根据其技能和偏好评估，识别最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项目。在新加坡，13岁及以上的学生参加结构化的职业指导项目，包括导师指导、职业会议和工作体验项目。

随着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确保学生顺利过渡到高等教育并成功完成学业已成为核心挑战。这些挑战既反映了体系设计上的差异（如招生模式、评估结构和财务激励），也反映了年轻人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教育路径的多样化。为了减少早期辍学并促进高等教育完成率，教育体系必须加强高中阶段学生的职业指导，提供更清晰、更灵活的路径。（摘编自“上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公众号）